



阿尔弗雷多·M·博南诺
无政府主义的张力
1996

于 2021-12-31 从 <https://zhuanlan.zhihu.com/p/427119119> 拾
获

作者原名为 Alfredo M. Bonanno。本文原题为 La Tensione anarchica。由 Jean Weir 翻译至英文。1996, Edizioni Laboratorio, Cuneo. 1998, Elephant Editions, London, Elephant Editions, B.M. Elephant, London WC1N3XX 由 Akizuki 从英文翻译至中文。

zh.anarchistlibraries.net

无政府主义的张力

阿尔弗雷多·M·博南诺



1996

当我开始演讲时，我总是有些尴尬，至少在开始时是这样。而这种尴尬在我们错误地称之为会议的情况下会增加，或者更谦虚地试图掩饰它们，称之为会议辩论。毕竟，这是一个从其他地方来的人的问题，也许是从另一代人那里来的，就像他们从过去雨后春笋般出现。有人站在这个教室里演讲，奇怪的是，甚至危险的是，他与那些敲打你的大脑的人相似，但意图却完全不同。然而，如果你仔细听，你会发现，除了表象，我将要概述的概念有相当大的区别。

这些概念中的第一个是以一个问题的形式出现的。什么是无政府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我提出这样的问题可能显得很奇怪，因为我确信这里有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因为我认识他们本人。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无政府主义者至少应该知道什么是无政府主义。然而，有必要一次又一次地拿起“什么是无政府主义”这个问题。甚至只说几句话也可以。这是为什么呢？这通常不会发生在生活的其他表现形式中，在其他活动或思想中，它们以某种基础将自己定义为某种东西。

所以无政府主义者一直在问自己同样的问题。什么是无政府主义？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因为这不是一个可以一劳永逸的定义，放在保险箱里，被认为是可以一点一点挖掘的遗产。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已经达到了一个确定性，或者一劳永逸地说：“在那里，从现在开始我掌握了真理，因此，至少从思想的角度来看，我是一个有特权的人”。任何像这样思考的人，仅从字面上看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相反，无政府主义者是一个真正把自己作为一个人放在怀疑中，并问自己的人。根据我所做的和我所想的，我的生活是什么？我每天在我所做的一切中，设法使自己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方式不断地和不成协议，做出小小的日常妥协等等，有什么联系？无政府主义不是一个可以像墓碑一样被锁在一个词里的概念。它不是一种政治理论。它是一种构思生活的方式，而生活，无论我们是年轻还是年老，无论我们是老人还是孩子，都不是最终的东西：它是一个我们必须日复一日地玩耍的赌注。当我们早上醒来，把我们的脚放在地上时，我们必须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是否是无政府主义者并没有什么区别。我们还不如呆在床上睡觉。为了有一个好的理由，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想做什么，因为对无政府主义来说，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我们所做的和我们所想的之间没有区别，但有

些思想力量，即我们先前谈到的澄清。斗争的积极结果和无政府主义团体的数量增长是两件事，不能被看作是一个因果的过程。它们可能有联系，也可能没有。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已经谈到了什么是无政府主义，什么是民主，以及我们不断面临的不理解；谈到了我们称之为现代资本主义、后工业资本主义的权力结构被改造的方式；谈到了一些今天不再被接受的无政府主义斗争结构，以及人们可以反对权力现实的方式，最后，我提到了传统无政府主义和当今的叛乱无政府主义之间的区别。

一个理论到行动、行动到理论的持续逆转。这就是无政府主义者与那些拥有另一种生活概念并将这种概念具体化为政治实践、政治理论的人不同的原因。

这就是通常不对你说的东西，这就是你从未在报纸上读到的东西，这就是没有写在书上的东西，这就是学校嫉妒地保持沉默的东西，因为这就是生活的秘密：永远不要把思想和行动分开，我们知道的東西，我們理解的東西，和我們做的東西，我們用它來執行行動。

这就是区分政治家和无政府主义革命家的原因。不是文字，不是概念，请允许我，在某些方面甚至不是行动，因为区分和描述行动的不是它们在攻击中的极端——让我们说是激进——的结论。甚至不是对目标的选择的准确性来限定它们，而是进行这些行动的人、同志成功地使它们成为他们生活的一个表达时刻的方式，一个具体的特征、意义、生活质量、快乐、欲望、美，而不是实际的实现，不是对一个本身就是目的的行为的沉闷的实现，使人能够说：“我今天做了一些事情”，远离我自己，在我存在的边缘。

在那里，这是一个区别。从这个区别中又出现了另一个区别，在我看来是一个相当大的区别。任何认为要做的事情是在我们自己之外，并作为一些成功和失败来实现的人——生活是一个楼梯，有时你会上升，有时你会下降。事情有顺利的时候，也有不顺利的时候。在那里，谁认为生活是由这样的事情组成的：例如，民主政治家的典型形象（看在上帝的份上，一个你可以和他交谈的人，一个友好的人，宽容的人，他有放任的一面，相信进步，相信未来，相信一个更好的社会，相信自由）好吧，像这样的人，可能不穿双排扣外套，不打领带，如此随意，一个近看像一个同志的人，他自己宣布他是一个同志，这个人很可能是一个警察，这没有区别。为什么不呢？有民主的警察，统一镇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的镇压有友好的一面，他们用很多精彩的想法来镇压我们。那我们怎么能识别这个人，这个民主人士，我们怎么能识别他？如果他用毛线蒙住我们的眼睛，不让我们看到他，我们怎么能抵御他？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事实来识别他：对他来说，生活就是实现，他的生活是由做事组成的，是在他眼前展开的定量的做事，而不是其他。

当我们与人交谈时，我们不能要求看他们的会员卡。他们的想法往往使我们最终完全困惑，无法理解任何东西，因为我们都是善良

的、进步的话匣子，都在赞美宽容之美，诸如此类。我们怎么能看到我们面前有一个敌人，是我们最坏的敌人？因为至少我们可以在老法西斯面前自卫。他打出来了，如果我们有能力，我们就回击他，更用力。现在情况变了，形势变了。今天甚至可以说很难钓出一个法西斯暴徒。但是，我们试图描述的个人，这个我们在学校、议会、街道或警察制服中随处可见的民主人士，一个法官或医生，这个家伙在这里是我们的敌人，因为他考虑生命的方式与我们考虑生命的方式不同，因为对他来说，生命是另一种生命，不是我们的生命，因为对他来说，我们是外星人，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也应该把他看作是我们星球的居民。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分界线。因为他的生命概念是定量的，因为他衡量成功或，如果你愿意，失败等事情，但总是从定量的角度出发，而我们衡量它们的方式不同，这就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生命在什么方面对我们有不同的意义，这种意义在质量上不同？

所以，这位和蔼可亲的先生对我们进行了批评，他说：“是的，无政府主义者是好人，但他们是无效的。他们在历史上做过什么？哪个国家曾经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曾经实现过没有政府的政府吗？一个自由的社会，一个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一个没有权力的社会，难道不是一个矛盾吗？”而这块砸在我们身上的批判性石头当然是是一致的，因为事实上，如果你仔细观察无政府主义者接近实现他们的自由社会乌托邦的任何地方，比如西班牙或俄罗斯，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这些构造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批评的。它们当然是革命，但它们不是自由意志革命，它们不是无政府主义。

所以，当这些先生们说，“你们是乌托邦，你们无政府主义者是梦想家，你们的乌托邦永远不会成功”，我们必须回答，“是的，这是真的，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张力，不是一种实现，不是明天早上带来无政府状态的具体尝试”。但是我们也必须能够说，但是你们，政府中尊敬的民主绅士们，他们管理着我们的生活，认为你们可以进入我们的头脑，我们的大脑，通过你们每天在报纸、大学、学校等地方形成的意见来管理我们，你们这些绅士完成了什么？一个值得居住的世界？还是一个死亡的世界，一个生命是平淡无奇的事情，没有任何质量，没有任何意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个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即将拿到养老金，然后问自己：“但我这一生都做了什么？这么多年来生活的意义何在？”

现在，由于权力在物理空间中实现自己，无政府主义者与此的关系很重要。当然，叛乱是一个单独的事实，因此在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个地方，在我们即将入睡的时候，我们会想“……好吧，最后分析一下，事情还不算太糟糕”，一个人对自己感到平静，并睡着了。在那里，在我们内心的那个特殊地方，那个私人空间，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活动。但随后我们必须把自己转移到社会现实的物理空间中。而物理空间，当你考虑到它时，几乎完全在权力的控制之下。因此，当我们在这个空间里活动时，我们带着这种叛乱的价值，这些革命的价值，并在冲突中衡量它们，而我们并不是唯一在场的人。

因此，我们必须对重要的目标进行分类，并核实它们的存在——幸运的是，这些目标永远存在，无处不在——并为创造条件做出贡献，使人们，即这些目标在其身上实现的被剥削者，做出一些事情来摧毁它们。

我认为这个革命过程具有叛乱的性质。它没有数量上的目标（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对一个目标的破坏或对一个项目的阻止不能用数量来衡量。有时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有人对我说：“但我们获得了什么结果？当某件事情完成后，人们事后甚至不记得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这些无政府主义者是谁？君主主义者？他们是这些支持国王的人吗？”人们记得不是很清楚。但这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必须记住的不是我们，而是他们的斗争，因为斗争是他们的，我们只是这场斗争中的一个机会。我们是额外的东西。

在自由的社会中，无政府状态已经达到了相当理想的程度，无政府主义者在各个层面的社会斗争中都是不可或缺的，他们的作用只是把斗争越推越远，消除哪怕是最小的权力痕迹，始终完善无政府状态的张力。无政府主义者在任何情况下都居住在一个不舒服的星球上，因为当斗争进展顺利时，他们会被遗忘，而当斗争进展不顺利时，他们会被指责为负有责任，指责他们以错误的方式对待它，指责他们把它带到错误的结论。因此，不要对任何量化的结果抱有幻想：如果从叛乱的角度实现的斗争是正确的，进展顺利，如果有任何结果，也可能是对促成它的人有用，当然不是对无政府主义者有用。重要的是，不要陷入许多无政府主义者不幸所做的幻想，即相信斗争的积极结果会导致我们团体的增长，因为事实并非如此，这将系统地导致幻灭。我们团体的增长和同志人数的增加是很重要的，但这并不是从所获得的结果中产生的，而是通过建立、形成这

的斗争，一部分人知道，另一部分人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在这里是否要再接再厉，我只是想把它作为一个例子来提一提。

所以叛乱的无政府主义必须克服一个基本问题。它必须超越一定的限度，否则它就只能停留在起义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经历过个人性质的起义的同志，那种在我们内心产生一种思想力量以反对意见的喋喋不休的照明，并形成亲和团体，通过一种非正式的结构与其他地方的同志建立关系，只实现了一部分工作。在某一点上，他们必须决定，必须超越分界线，迈出不容易回头的一步。他们必须与不是无政府主义者的人建立关系，涉及一个中间的、有限制的问题（例如，摧毁科米索的基地）。不管这个想法有多么奇妙或有趣，它肯定不是无政府主义的实现。如果人们真的设法进入基地并摧毁它，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可能什么都没有，也可能什么都没有。我不知道，没有人能说得清。但实现破坏性事件的美妙之处，并不在于其可能的后果。

无政府主义者不保证他们所做的任何事情。他们指出个人和结构的责任，是基于他们决心采取行动的决定，从那一刻起，他们对自己感到有把握，因为他们的正义观念照亮了他们的行动。它指出了一个人的责任，或更多人的责任，一个结构或更多结构的责任，以及这种责任导致的后果。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无政府主义者的行动决心。

但是，一旦他们与其他人一起行动，他们也必须努力建立能够在反对权力的斗争中保持团结并创造后果的有机体。我们决不能忘记这一点。而这是需要反思的重要一点：权力在时间和空间中实现自己，它不是抽象的东西。如果警察局不存在，如果监狱不存在，控制是不可能的。如果议会不存在，或者没有小的地区议会，立法权就不可能存在。如果没有学校和大学，就不可能有压迫我们、制造舆论的文化权力。现在，学校、大学、警察局、监狱、工业、工厂，都是在特定的地方实现自己的东西，在限定的区域内，我们只有在接受特定的条件和玩游戏的情况下才能在这些地方活动。我们此刻在这里，是因为我们同意玩这个游戏。否则我们就无法进入这栋楼。这很有意思。我们可以使用这种结构。但在攻击的时候，这种地方是禁止我们进入的。如果我们是抱着攻击的目的进入这里，警察显然会阻止我们。

这就是你们的成就，这就是你们的民主，你们对人民的想法。你们在治理人民，但人民是什么意思？谁是人民？他们也许是那一小部分，甚至不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他们投票，参加选举，投票给你，提名一个少数人，而这个少数人又提名另一个比第一个更小的少数人，以法律的名义管理我们？但是，如果这些法律不是少数人利益的表达，那又是什么呢，首先是为了有利于他们自己的致富前景，重新加强他们的权力，等等？

你们以一种力量的名义进行治理，这种力量来自于什么？从一个抽象的概念出发，你们实现了一个你们认为可以改进的结构……。但是在历史上，它是如何，以何种方式被改进的？如果不是死亡，不是质量的扁平化，我们今天所处的是什么状况？这就是我们需要向民主的支持者提出的批评。如果我们无政府主义者是乌托邦，我们是作为一种对质量的紧张；如果民主派是乌托邦，他们是作为一种对数量的减少。而反对减少，反对在一个对他们来说损害最小、对大量被剥削的人来说损害最大的层面上生活的萎缩，对于这个悲惨的现实，我们反对我们的乌托邦，它至少是一个质量的乌托邦，是对另一个未来的紧张，一个将与我们现在的生活完全不同的未来。

因此，所有以政治现实主义的名义与你们交谈的人，国家人员、教师（他们是国家人员的仆人）、理论家、记者，所有像这样穿过教室的知识分子，在他们的演讲中用现实主义的冷静、宽容的话语说话，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有的东西，现实就是这样，必须做出牺牲；在这里，这些人在骗你们。他们在骗你，因为你可以做别的事情，因为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有能力以我们受伤的尊严的名义在这种骗局面前站起来。因为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能意识到我们被骗了，因为我们终于意识到什么是对我们不利的行为。而在反抗这一切的过程中，我们不仅可以在可能了解的范围内改变事物的现实，而且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使其值得被生活。一个人可以在早晨起床，把自己的脚放在地上，看着镜子对自己说：“我终于设法改变了事情，至少就我而言”，并感到自己是一个值得过自己生活的人，而不是一个你甚至看不清楚的木偶人手中的傀儡，可以在他们脸上吐口水。

因此，这就是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不断回到无政府主义是什么的问题上。因为无政府主义不是一个政治运动。或者说它是，但只是

在一个小方面。无政府主义运动在历史上呈现为政治运动的事实，并不意味着这就穷尽了无政府主义的所有生命潜力。无政府主义不会在库内奥的无政府主义团体，或都灵、伦敦或其他地方的团体中解决自己。这不是无政府主义。当然，那里有无政府主义者，或者至少应该假设有，那种已经单独开始自己的叛乱的同志，已经意识到他们被迫生活的义务和胁迫的背景。但无政府主义不仅仅是这样，它也是一种张力，是生活的质量，是我们设法从自己身上汲取的力量，是改变现实事物的能力。无政府主义是这个转变项目的整体，与我们在实现自己的个人转变时在自己身上实现的东西有关。因此，它不是一个可以被历史化的可量化的事实。它也不是一个将在时间过程中简单发生的事件，通过特定的理论、人、运动以及为什么不呢，精确的革命行为出现。总是有比这些元素的总和更多的东西，而正是这种更多的东西继续使无政府主义以其他方式继续存在。

因此，我们不断地需要在这种走向绝对其他的东西、不可想象的东西、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在不很清楚如何实现的情况下实现的维度）的张力与我们能够和正在做的事情的日常经验之间维持一种关系。一种精确的变化、转变的关系。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到的第一个例子是另一个矛盾的因素。想一想“有问题要解决”这一说法背后的概念。这是一个经典的短语。我们都有问题要解决。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生活是一个问题，我们的社会条件，必须突破限制我们的圈子，直到简单的日常事务。我们认为所有这些都是一个问题。

这里存在着巨大的误解。为什么？压迫我们的结构（我想在座的很多人都是学生）坚持认为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他们可以为我们的解决这些问题。此外，他们还用几何学、数学等方面的问题作为例子来解决。但是这种问题，那些被认为是可以解决的数学问题是虚假的问题，它们根本就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它们的答案只是以另一种形式重复同一个问题，用技术术语来说就是同义反复。一个人说了一件事，却以另一种方式重复同一件事来回答。所以，基本上，问题根本没有得到解决，它只是被重复。

而当我们谈论解决一个涉及我们所有人的生活、我们的日常生存的问题时，我们谈论的是如此复杂的问题，以至于它们不能简化为对问题本身的简单重述。以“警察的问题”为例。警察的存在对我

于单一团体中的深化知识的团体进行接触？这种接触可以通过非正式组织来保证。

但什么是非正式组织？各个亲和团体之间可能存在着非正式的关系，它们为了交流思想和共同做事而相互接触，因此存在着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在全国范围内也非常普遍，甚至由几十个，或者为什么，几百个组织、结构、基于讨论、定期分析、共同做事等的非正式性质的团体组成。起义无政府主义的组织逻辑与我们前面提到的关于无政府主义的组织不同。这里提到的组织形式值得深入研究，这是我现在在会议的范围无法做到的。但在我看来，如果不是为了实现无政府主义运动以外的关系，也就是通过建立外部团体、外部核心，也有非正式的特点，这样的组织方式将仅仅停留在无政府主义运动内部。这些团体不应仅仅由无政府主义者组成，只要他们考虑到一些基本条件，任何打算为实现特定目标而斗争的人，即使是有限制的目标，都可以参加。首先是永久的冲突，也就是具有攻击他们所处的现实而不等待其他地方的命令的特点的团体。然后是“自治”的特点，即完全不依赖政党或工会组织，也不与之有任何关系。最后，他们的特点是逐一面对问题，不提出一般要求的平台，这些平台将不可避免地转化为小型政党或小型替代性工会的管理。对这些想法的总结可能看起来相当抽象，这就是为什么在结束之前我想举一个例子，因为其中一些东西可以在实践中更好地理解。

80年代初，在试图阻止美国在科米索建造导弹基地的过程中，就使用了这种理论模式。干预了两年的无政府主义者建立了“自我管理的联盟”。这些自我管理的联盟正是在该地区活动的非无政府主义团体，其独特的目的是通过在实现过程中破坏该项目来阻止基地的建设。

这些联盟是自治的核心，其特点是他们的唯一目标是攻击和摧毁基地。他们没有处理一系列的问题，因为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他们就会成为工团主义者的团体，目的是，比方说，保护工作或寻找工作或解决其他直接问题。相反，他们的唯一目标是摧毁基地。第二个特点是长期冲突，即从这些团体成立的那一刻起（它们不是专门的无政府主义团体，但其中有无政府主义者），它们就与参与建设基地的所有力量发生冲突，而这种冲突并没有由任何代表机构或推动这一倡议的无政府主义者决定或宣布。第三个特点是这些团体完全自治，也就是说，它们与任何政党或工会等没有联系。反对基地

在强大的工人阶级的假设中，人们可以对这段话自欺欺人，并据此进行组织。例如，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组织建议看到了一个强大的工会主义运动，它渗透到工人阶级并组织了几乎整个工人阶级，要实现这种征用和通过。这个从一开始就可能是神话的集体主体，即使在其神话版本中也不再存在，那么革命性质的联合主义运动有什么意义呢？在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中又有什么意义呢？完全没有。

因此，斗争必须从其他地方开始，从其他思想和方法开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 15 年来一直在发展对工会主义和无政府-工会主义的批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是，并把自己定义为叛乱的无政府主义者。不是因为我们认为解决方案是街垒——街垒可能是不属于我们自己的选择的悲剧性后果——而是我们是叛乱主义者，因为我们认为无政府主义行动必然要面对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是无政府主义所希望的，而是那些当权者所建立的现实所强加的，我们不能仅仅通过希望它们消失来抹杀它们。

因此，一个将自己推向未来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应该是灵活的。它不能以过去结构的繁琐特点和数量上的沉重感来展示自己。它不能像过去的组织那样以综合的形式出现，在过去，无政府主义组织声称要在“委员会”中总结现实，处理所有的问题，在定期的大会上根据甚至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的论文做出决定。所有这些都过时了，这并不是因为它的想法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而是因为现实已经发生了变化。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坚持认为有必要在亲和力的概念基础上形成小团体，甚至是由极少数同志组成的小团体，他们相互了解并加深这种了解，因为如果一个人不了解另一个人，就不可能有亲和力。一个人只有通过深入了解决定自己差异的因素，通过经常接触对方，才能认识到自己的亲和力。这种认识是个人的事实，但它也是一个思想、辩论、讨论的问题。但就我们今天晚上提出的第一点而言，如果你们记得，如果没有带来行动的实践，就不可能有深入的想法。因此，有一个持续的互惠过程，即进入想法和实现行动。

一小群同志，一个仅仅在晚上见面聊天的小团体，不会是一个亲和团体，而是一群朋友，酒吧里的伙伴，他们在晚上见面，谈论阳光下的任何事情。相反，一个团体开会讨论事情，并在讨论中为行动做准备，并通过行动促进发展讨论，将自己转化为对要做的事情的讨论，这就是亲和团体的机制。那么，亲和团体如何与其他存在

们许多人来说是一个问题。毫无疑问，警察是国家用来阻止我们做某些事情的压制工具。你如何解决这样一个问题？警察的问题能解决吗？这个问题本身就显示出它的荒谬性。不存在解决警察问题这样的事情。然而，从民主的角度来看，有可能通过某些结构的民主化、改变警察的态度等来解决一些问题。现在，认为这可能是解决控制和镇压问题的办法，既愚蠢又不符合逻辑。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一种符合权力、国家利益的调控镇压的方式。如果今天的民主政治是有效的，那么未来的控制和镇压的远非民主的结构可能会像过去一样有效，任何在这个问题上还有其他想法的罕见的、边缘的少数人都会被驱逐或从队伍中淘汰。

当我说警察时，我指的是任何镇压结构，从军事警察到司法机构，所有为控制和镇压服务的国家表达。所以，正如你所看到的，社会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民主结构运作的骗局正是他们声称要解决这些问题。这个骗局显示了民主政治是如何不以现实为基础，甚至不以最低限度的具体性为基础。一切都建立在这样的暗示上：事情可以被改善，可以及时解决，可以被纠正。权力的力量就在于这种拨乱反正的概念，也正是在这种改善的基础上，权力才得以存在并在中期和长期持续。权力关系在我们等待他们承诺的事情发生时发生了变化，但它永远不会发生。因为这些改进从未实现。因为权力在历史上不断变化和转变，却始终保持不变。一小撮人，少数拥有特权的人，他们掌握着权力的杠杆，照顾自己的利益，维护谁碰巧在指挥的优越条件。

现在，我们有什么手段来对抗这种状况？他们想控制我们？所以我们拒绝控制。当然，我们可以这样做。我们无疑是这样做的，试图将伤害降到最低。但在社会背景下拒绝控制只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我们可以限制它的某些方面，当我们受到不公平的打击时大喊大叫；但显然在某些权力领域，规则被称为法律，路标指示围墙，自称为警察的人阻止我们进入。毋庸置疑，试着进入议会，看看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某些级别是不能超越的，某些控制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我们该如何反对这种情况？只是做梦吗？有一个自由的想法，而且这个想法必须仔细制定，因为我们不能说：“无政府主义者想要的自由只是控制的减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发现自己面临的问题是：“但这种控制的减少在哪里结束？”也许是在一个最

小的水平上？例如，如果国家不再是今天的压迫者国家，而是成为，比方说，自由主义者的理想的最小国家，那么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国家会变得正当吗？不，当然不会。所以这不是思考的方式。这不是一个试图限制控制的问题，而是一个完全废除控制的问题。我们不赞成更多的自由。当奴隶的锁链被拉长时，他就会得到更多的自由。我们是为了废除锁链，所以我们是为了自由，而不是更多的自由。自由意味着没有所有的锁链，没有限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

自由是一个困难的、未知的概念。它是一个痛苦的概念，但它却被兜售为美丽、甜蜜、安逸的东西。就像一个遥远的梦想，它让我们感觉很好，就像所有的东西，由于遥远，构成了希望和信仰，一种信念。换句话说，这些表面上解决了今天的问题的无形资产，实际上并没有解决这些问题，而只是把它们迷住了，把它们改变了，使我们无法对我们时代的所有困境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好吧，总有一天我们会获得自由。好吧，事情是一团糟，但在这团糟中，有一种地下的力量，一种独立于我们自己的非自愿的秩序，它代替我们工作，它将逐渐改变我们所处的痛苦条件，把我们带到一个自由的空间，在那里我们都将幸福地生活。不，那不是自由，那是一个骗局，悲惨地类似于旧的上帝的观念，这种观念经常帮助我们，而且今天仍然帮助许多人受苦，因为他们对自己说，“很好，我们今天在受苦，但我们在来世会更好”。事实上，正如福音书所说，最后的人将会是第一个，使今天最后的人感到振奋，因为他们把自己看作是明天的第一个。

如果我们把这种自由的想法当作真实的，那么我们所做的不过是通过给社会伤口上药来抚慰今天的痛苦，就像牧师治疗那些听他布道的穷人一样，欺骗自己说上帝的国度将拯救他们的痛苦。无政府主义者不能这样想。自由是一个破坏性的概念，它涉及到对所有限制的绝对消除。现在，自由是一个我们必须牢记在心的概念，但同时我们需要明白，如果我们渴望自由，我们必须准备好面对破坏所涉及的所有风险，所有破坏我们所处的宪法秩序的风险。自由不是一个可以把自己搂在怀里的概念，希望改善会独立于我们的实际干预能力而发展。

为了理解这种概念，意识到挥舞这种危险概念所带来的风险，我们必须能够在内部形成这种想法。

到人时，他指的是工人。在他对价值的分析中，他是在谈论工作节奏；在他对异化的分析中，他是在谈论工作。没有什么是不涉及工作的。但这是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分析发展的时候，工人是其核心。工人阶级可以被看作是社会结构的中心。

无政府主义者利用不同的分析，也接近于认为工人的地位是社会世界的中心。想想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分析。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将工会斗争的概念发挥到极致的问题，将其从工会谈判的狭隘层面中解放出来，并通过总罢工将其发展到革命的实现上。因此，根据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观点，未来的社会，即自由的无政府主义社会，无非是现在的社会从权力中解放出来，但具有相同的生产结构，不再掌握在资本家手中，而是掌握在共同管理它们的集体手中。

由于各种原因，这一概念在今天是相当不可行的。首先，因为技术改造已经使我们不可能从现在的社会简单地进入到我们希望生活的未来社会中。一个直接的通道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不可能的形式，以解放的方式使用信息技术。新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并不局限于在特定的工具中带来某些修改，它们也改变了所有其他的技术。例如，工厂并不是简单地将过去的结构加上计算机技术，而是变成了一个计算机化的工厂，这是很不同的。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只能以非常笼统的方式提及这些概念，因为要充分了解它们需要时间。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不可能使用这一遗产。这段话与工人阶级的中心地位的神话的结尾平行。

现在，在工人阶级实际上已经解体的情况下，征用生产资料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那么，结论是什么呢？唯一可能的结论是，我们面前的这套生产工具被摧毁。唯一可能的办法是通过毁灭的戏剧性现实。如果我们想象中的革命，而且我们不能确定它是否会发生，那么它就不会是过去那种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单一事件的革命，甚至可能在一天或一个美好的夜晚发生，而会是一个漫长的、悲惨的、血腥的事件，可能会经过难以想象的暴力、难以想象的悲惨过程。

所有这些都是我们正在走向的那种现实。不是因为那是我们所渴望的，不是因为我们喜欢暴力、血腥、破坏、内战、死亡、强奸、野蛮。并非如此，而是因为这是唯一合理的道路，是那些统治我们的人和指挥者所希望的转型所必需的道路。他们已经走上了这条道路。我们不能用简单的幻想、简单的梦想来改变这一切。在过去存

有限，有很大的能力快速做出是或不是的决定。他们知道如何在两种可能性之间做出选择：一个黄色按钮，一个红色按钮，一个黑色按钮，一个白色按钮。这就是他们正在建立的一种心态。他们在哪里建立这种心态呢？在学校，但也在日常生活中。

他们会用这样的人做什么？他们将利用他们来实现所有的修改，这些修改是重组资本所必需的。他们将有助于更好地管理明天的资本主义的条件和关系。而这些关系将是什么呢？它们将建立在越来越快的变化上，呼吁满足不存在的欲望，这些欲望是由越来越多的小团体试行和决定的。这种新的人与我们能够想象或渴望的东西截然相反，与质量、创造力相反，与真正的欲望、生活的快乐相反，与这一切相反。我们怎样才能与这种技术人的实现作斗争？我们怎样才能与这种情况作斗争呢？我们能不能等待某一天的到来，一个将颠覆世界的伟大日子？上个世纪的无政府主义者称之为“伟大的夜晚”（la grande soirée）？伟大的夜晚或伟大的一天——“le grand jour”——其中没有人可以预见力量将最终接管，爆发出我们都在等待的社会冲突，称为革命？那么一切都会改变，会有一个完美和快乐的世界？

这是一个千禧年的想法。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千禧年的尾声，它可能再次扎根。但条件已经改变。这不是现实，我们感兴趣的不是这种等待。我们感兴趣的是另一种干预，一种更为温和的干预，但它能够取得一些成果。作为无政府主义者，我们被召唤去做一些事情。我们被我们自己的个人责任和我们前面所说的所召唤。从这个想法照亮我们头脑的那一刻起，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想法，而是正义、自由的想法，当这些想法照亮我们的头脑，我们看到我们面前的骗局——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定义一个民主的骗局——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必须着手工作，而这种着手工作也意味着将我们自己组织起来。这意味着在无政府主义者之间创造参考和联系的条件，这些条件必须与过去的条件不同。

现实已经改变。正如我之前所说，他们正在建造一个不同的人，一个不合格的人，他们正在建造他，因为他们需要建造一个不合格的社会。他们把工人的形象从政治社会概念的中心移开，因为他被取消了资格。在过去，工人是剥削的最大受害者。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认为这个社会形象必然会催生革命。只要想到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就够了。马克思的《资本论》致力于工人的“解放”。当马克思说

在这一点上也存在着相当大的混乱。人们习惯性地认为，任何经过我们头脑的东西都是一种观念。人们说“我有一个想法”，然后试图去理解这意味着什么。这是笛卡尔式的观念，与柏拉图式的观念相反，后者是一个抽象的遥远的参考点。但是，当我们说到理念时，这并不是我们所指的内容。理念是一个参照点，是一个能够改变生活的力量要素。它是一个充满价值的概念，成为一种力量的概念，是能够发展并使我们的关系不同的东西。所有这些都是一个概念。但是，使阐述这种想法成为可能的元素的来源是什么呢？学校、大学、报纸、书籍、教师、技术人员、电视等等？从这些信息和文化阐述的工具中，有什么东西到达我们手中？大量的信息堆积在我们身上，像大锅一样在我们体内沸腾，使我们产生意见。我们往往不是有想法，而是有意见。

这就是悲剧性的结论。什么是意见？它是一个扁平化的想法，一个为了让最多的人接受而变得统一的想法。意见是大众化的想法。对权力来说，维持这些意见是很重要的，因为正是通过意见，对意见的控制，他们才获得了既定的结果，更不用说通过媒体的宣传和选举程序的机制。新的权力精英的形成不是来自思想，而是来自意见。

那么，反对舆论制造意味着什么？它是否意味着获取更多的信息？也就是用反信息来反对信息？不，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你怎么看，你都不可能用反信息来反对我们每天被轰炸的大量信息，反信息能够通过调查隐藏的原因来“揭开”被所有信息性谈话掩盖的现实。不，我们不能朝这个方向操作。每当我们试图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会意识到这是毫无意义的，我们无法说服人们。

这就是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总是批判性地考虑宣传的问题。是的，当然，正如你所看到的，这里有一张摆放整齐的桌子，在这种倡议或会议上总是如此。这里总是有我们的小册子，我们的书。我们有大量的论文，而且非常善于推出这样的出版物。但这并不是我们需要做的唯一工作，而且无论如何，它们都不包含反信息的内容，或者说，如果它们包含的话，也纯粹是偶然的。这项工作的目的主要是，或者说应该是，建立一种思想或一些主导思想，一些强有力的思想。

让我们只举一个例子。在过去的三四年里，发生了一件事，报纸用“tangentopoli”或“clean hands”（在法律程序中，许多政治

家因接受资本家的金钱以换取公共工程部门的合同而被判刑)等可怕的术语进行报道。现在,这一行动在人们的头脑中灌输了什么?它建立了这样一种观点:法律能够纠正错误,能够对政治家进行判决,能够改变条件,因此能够把我们从意大利第一共和国的典型旧观念带到第二共和国的新观念。这种意见,这种过程,显然是非常有用的。例如,它允许出现一个“新”的权力精英来取代旧的权力精英。在一定程度上是新的,但具有某些特征,是旧习惯和旧人物的可悲重现。这就是舆论的运作方式。

现在,请考虑将这种仅对权力有相当大好处的舆论制造过程与可能是对正义概念进行深入分析的思想力量的构建进行比较。差距是深渊般的。但什么是正确的呢?例如,对许多人来说,前社会主义党领导人克拉克西被迫继续被关在突尼斯的别墅里,这当然是正确的,我们自己也认为是正确的。整个事件相当有趣,它甚至让我们发笑,让我们感觉很好,因为当这种级别的猪最终被淘汰的时候是相当不错的。但这是真正的正义吗?例如,安德烈奥蒂就遇到了困难。似乎他亲吻了里纳[黑手党老大]的脸颊。

这样的消息当然会让我们微笑,让我们感觉更好,因为像安德烈奥蒂这样的猪,即使在简单的身体层面也是令人讨厌的,只是在电视上看到他就足够了。但这种正义的想法是什么呢?起诉方的法官迪皮耶罗和博雷利有一大群支持他们的粉丝。数以百万计的人被卷入这个统一意见的过程。

我们需要思考的正义概念有什么不同吗?它应该导致什么?它应该让我们认识到,如果克拉克西或安德烈奥蒂有责任,那么像迪皮耶罗或博雷利这样的人也有同样的责任。因为如果前者是政治家,那么其他人都是地方官员。正义的概念意味着在支持和维护权力的人和反对权力的人之间划定一条分界线。如果权力的存在本身就是不公正的,如果所有的尝试(其中一些我们刚刚看到)都显示出它们不过是自我辩护的骗局,那么任何有权力的人,无论他多么民主,无论他做什么,总是站在正义的错误一边。

建立这样一个正义的概念显然意味着形成一种思想,一种你在报纸上找不到的思想,一种在教室或大学礼堂里没有深入研究的思想,它不能成为舆论的要素或引导人们投票。事实上,这样的想法会导致内部冲突。因为在自己的法庭面前,人们会问:“但是我,我对社会正义的想法,当迪皮耶罗所做的事情看起来不错时,我怎

么看?我是不是也被人利用了?我是否也是舆论的工具,是维护权力的伟大进程的终端,不仅成为他们的奴隶,也是他们的帮凶?”

我们终于到了那里。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自己的责任点。因为如果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理论和行动之间真的没有区别的话,只要社会正义的想法在我们心中亮起,照亮我们的大脑,哪怕是一瞬间,它就永远无法再熄灭了。因为无论我们怎么想,我们都会感到内疚,会觉得我们是帮凶,是歧视、镇压、种族灭绝、死亡过程的帮凶,这个过程我们将永远无法再感到脱离了。否则我们怎么能定义自己是革命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同谋交给当权的暗杀者,我们会支持什么自由?

你看,不管是谁,通过对现实的深入分析,还是仅仅因为偶然或不幸,成功地让一个像正义的想法这样清晰的想法进入他们的大脑,情况是多么不同和关键?有许多这样的想法。例如,自由的理念也是类似的。任何思考过自由究竟是什么的人,哪怕是片刻,都不会再满足于仅仅做一些事情来稍微扩大他们所处环境的自由。从那一刻起,他们会感到内疚,并试图做一些事情来减轻他们的痛苦感。他们会担心自己做错了,因为直到现在还没有做任何事情,从那一刻起,他们的生活将完全改变。

基本上,国家想从意见的形成中得到什么?权力想要什么?是的,当然,它想创造大众舆论,因为他们能够从中实现某些操作,如投票、形成权力集团等等。但这并不是他们想要的全部。他们想要我们的共识。他们想要我们的认可。而共识是通过精确的工具获得的,特别是那些文化性质的工具。例如,学校是实现共识的水库之一,未来的知识分子,而不仅仅是知识分子,是由学校建立的。

今天,资本主义需要的是与过去不同的人。直到最近,人们还需要具有专业能力的人,对这种能力和特殊资格感到自豪。现在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工作世界要求的资格水平很低,而过去不存在的、甚至是不可想象的品质,如灵活性、适应性、宽容、在会议上干预的能力等等,都需要取而代之。

例如,基于装配线的巨大生产单位现在使用机器人,或建立在岛屿的概念基础上,小团体一起工作,他们互相认识,互相控制,等等。这种心态不仅存在于工厂中。他们正在建造的不仅仅是一个“新工人”,而是一个“新人”;一个灵活的人,想法不多,欲望相当不透明,文化水平大大降低,语言贫乏,阅读标准化,思考能力